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部新作中,张维为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与世界,以平铺直叙的风格来与读者共同探讨了关于中国崛起的各种话题。近日,他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举办讲座,与学子们探讨如何读懂中国这个正在世界崛起的国家。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张维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定价30.00元

□本报记者 钟华

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是迷信书本还是尊重实践?我们是削足适履、屈从西方的价值观,还是实事求是,总结中国文明复兴的经验?

年初,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书。不到3个月的时间,该书已加印4次,不仅读者好评如潮,更在国内的政治理论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撼”。该书的作者张维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英文翻译,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兼任教授。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的他,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的文章。

1+1>2的中国效应

“板块”的概念是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他说:“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看中国一定要有板块的概念,否则看不清楚。比如在拳击运动当中,重量级的和轻量级的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质的问题。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它是一个特殊的类型,GDP不能够解释清楚中国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要把中国的问题讲清楚,一定要用板块的概念。如果要大致一点讲,可以分成准发达国家板块和一个新兴经济体的板块,细分的话可以进一步分成发达板块和欠发达板块。”

在书中,张维为写道,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和一个超大型的“新兴经济体”板块。如果说前者的主要特点是现代经济、现代管理、现代研发、现代服务业,那么后者的主要特点就是巨大的规模效应和成本效应,两者的结合某种意义上就是质和量的结合。这种结合便产生了1+1>2的中国效应。正是这种结合使得中国崛起得如此之快。

准发达板块,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线城市,这些地区的硬件已经全面超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寿命、教育水平科技等很多方面都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而之所以用一个“准”字,就是说有些方面不如人家,比如,就是一般民众的文化素质,我们还有差距。而新兴经济体板块,比方说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它们实际上发展也很快,发展的态势也很好。实际上中国的发展战略从大局看是这样的,沿海地区的发展带动内地。现在搞中西部建设,实际上还是放在几个城市去搞,重庆、长沙等等,通过这几个城市来带动整个内地的发展。我自己觉得实际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大致上就是这样不断的扩展,我们基本上完成了这样一个现代化的事业。

两个板块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从“静态”转入“动态”。中国经济不是一批数字的堆积,而是两个板块之间的大规模互动,是上面还有一个比较中性的、高效的中央政府在全面规划和大力推动的1+1的良性互动。中国这两个板块的关系是相互提携、共同发展的关系,这将使得中国经济和社会充满了活力。

中国的崛起是伟大文明的复兴

在很长时间里,西方主流的政治学者说中国很难成为现代国家,说我们只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就是说,我们有古老的文明,但无法实现现代的经济、现代的国防、现代的行政。“所以美国一位很有名的政治文化学者讲过,他说中国文明实际上是一个假装的国家,这个观念占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他认为我们的传统是我们成为现代国家的包袱。去年英国的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他说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国家,但它又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两者有时候有冲突。”张维为说。

书中,这位英国学者把“文明国家”的概念变成了中性的概念而不是消极的概念,这一点得到了张维为的认同:“我看了他的书以后,觉得他这种说法是对的。实际上中国会比他讲的走得更远,我们在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中国的历史学家把中国的现代国家分成三个结构:上层结构、下层结构、中层结构。他说中华民国时期,就是1949年以前,建立了一个上层结构,我们第一次有了教育部、财政部、中央银行、外交部等等,我们开始有现代的框架了,但这个上层结构跟中国的底层是脱节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创建了底层结构,他把中国最基层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通过中国的农会、中国的土改,把中国的底层结构给建立起来了。他提到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建立中国的中层结构,跟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中介、物流、银行、保险等等,只有在这样一个结构下一个社会才能运作起来。”

“现在除了极少数的国家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大部分国家认同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我们有5000年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它和现代国家的体制结合起来。世界上现在把一个古老的文明和一个现代国家重叠起来的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就此,张维为又提出了一个概念——“文明型国家”。他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5000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文明型国家”的八大特征

张维为总结出“文明型国家”的八大特征,第一是超大型国家。他说,中国等于100个欧洲中等国家,这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所以中国影响世界的特点是自己先做起来,然后通过人口规模来影响。

第二是超广阔的疆域国土。中国不能采取西方模式,根本的原因是历史上我们国家的成长过程是承载上千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对于中国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巨大的战略空间。另外,我们处于整个东北亚、东亚的核心地点,这种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影响是不得了的。所以这一点其他国家很难比得上。第三是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很多传统的东西是我们的优势,就看你怎么看它,怎么利用它。第四是超深厚的文化积淀。

第五是独特的语言,汉语是这世界上非常独特的一种语言,它是我们文化命脉的衍生,我们的语言体现了我们所有主要的民族特性,这种语言始终在寻找共性。我自己觉得如果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管什么问题,沿着这种思路解决,求同存异的效果会比较好。

第六是独特的政治。这么大的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它的政治传统又是不一样的。中国政治的传统历史上是一种统一的儒家执政机构,它有两个核心概念,第一个叫人心向背,第二个叫选贤任能。我们的制度特点是选拔,我们中国人是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所以不要低估中国自己的模式。

第七是独特的社会,我们的社会是由家庭逐步延伸开的,这种关系它有一种比西方制度社会更加可靠的依据。

第八点就是独特的经济,在现代中国的模式下,传统的人本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这两种经济学是结合起来的,我们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实际上是把这种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互相结合起来,它是一个理想的模式,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模式”也成为了国际学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或许是“中国模式”论的最坚实有力的理论著作。张维为教授通过自己走访一百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以国际关系学者的深厚学术背景,以其独特观察和理性分析,丰富了“中国模式”的深刻含义,他提出的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也为“中国模式”的发展和探索提供了一条值得深思的线索。

为了历史不让人绝望

□叶雷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读历史,总是让人绝望。

被《首败:甲午年的中日决战》这本书所吸引,是它腰封上的一连串问号:中国现代化为何被日本两次强行中断?日本人为什么会用打败中国作为对自己脱亚入欧的检阅?被打败的甲午一代为什么会师从日本?我们今天还敢正视与日本的差距吗?我们在今天还能打赢中日海战吗?我们如何面对新世纪的又一个甲午:2014?

一山不容二虎。在近代以前,日本甘愿当中国的学生,所以中日倒也相安无事。可是,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再也看不起半殖民主义半封建的中国,不愿意当学生了。代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伊藤博文将军,早在甲午战争的前一年,就板起脸当起了“先生”,他对他的同学、清政府的海军提督丁汝昌说:‘您很清楚……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贵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如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否则只会垮台。”可是,“死要面子”的垂死帝国却怎么也放不下“师者尊严”的架子,于是有了甲午年的中日决战。丁汝昌后悔没有听同学的“教诲”,也不愿以学生的身份再见到老同学,便吞食鸦片自我了结了。甲午决战的结果,也就成了中日两国历史的分水岭。

作者师永刚在《首败》上花的心思很多,他站在历史的身后,用3D模拟海战图再现战争现场;他在日本人的照片里,西洋人的明信片里,中国人的旧图册中,梳理和打捞出百幅珍贵历史图片资料,还原历史真相,呈现历史细节;他跳出海战本身,解读这甲午前后五十年,重新审视这场败局对中国后世的影响。

师永刚在书的《序》中感慨:“没有什么比重读历史更让人感慨,大戏开场,后来者已窥见结局,却偏要捏着汗,流着泪,看那些正在舞台中央的人与自己无法逆转的命运相抗争。”是啊,我和作者有同样的感受。但在翻书的过程中,我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直到现在,“我们如何面对新世纪的又一个甲午?”我总是不自觉就拿出来问问自己。中间,还做过几场噩梦,梦见那充满硝烟、惨烈无比的海战,梦见丁汝昌吞食鸦片自杀的狰狞面相。

甲午前的中国,不是正在经历“同治中兴”吗?30年的洋务运动似乎效果明显,打败了太平天国,左宗棠收复了新疆,冯子材、刘永福屡破法军……美国的《纽约时报》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我们自豪啊,1891年,也就是甲午海战的三年前,李鸿章的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明治天皇也为舰队的实力赞叹啊。可是啊,那场海战仅仅只持续了4个多小时,随后就是旅顺口失守,刘公岛失陷,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耻辱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李鸿章也许真有无奈,但今天的历史已经没有必要为他甩掉“卖国者”、“千古罪人”的帽子了。

哲学家黑格尔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是,没有人能够从中学到任何东西。”这大概也是“读历史,总是让人绝望”的原因所在。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设一下抗日战争时,日本没有拉长战线而专注中国,没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没有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没有苏联的出兵……我们不知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不知道会不会看到“让人绝望的历史”。

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要面对新世纪的又一个甲午了,这不仅让我想起了另一段“让人绝望的历史”。美苏争霸的“冷战”,那个世界第二的强国苏联,那个拥有数万枚导弹、核弹,数万辆坦克,上万架先进的米格战斗机,数千艘舰艇,航空母舰和四百万军队的苏联,那个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资源的苏联,连甲午海战的悲壮都还没来得及经历,就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

甲午战争不仅是一场战争,更是一场严峻的精神事件。中国何以战败?中国何以自强?“一战而人皆醒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此后,中国的有志青年开始行动了,他们到日本去留学,到这个昔日的小学生那里去寻找答案。

《首败:甲午年的中日决战》,师永刚、张凡编著,凤凰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定价:32.80元。

我们如何面对新世纪的又一个甲午:2014?我们如何面对以后的每一个甲午?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让我们以甲午为祭,在中国和平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头,我们宁可甘为学生。

是的,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一个新的“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开始了,但这次的历史不会让人失望,更不可能是绝望。

熊培云眼界开阔,耳濡目染,对西方社会的政治文明有独到的理解。如此丰富的阅历,写起评论来自然如行云流水。这么多年来,曾经深得其文字教益的人,究竟会有多少?这恐怕是一个不好揣测的问题。

为当代中国社会寻找理想与共识

□冯磊

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是熊培云的读者。从《思想国》开始,到《重新发现社会》,然后到现在手头这一本《自由在高处》,其中的很多文字,我都是熟悉的。

中国的社会,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物资上的原始积累。未来,这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可以达到文明民主的高度,自然也是诸多知识分子和贤达人士所焦虑和关心的。在此类思想者(姑且称之为思想者吧)中,熊培云是比较耀眼的一位。此君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后到巴黎大学深造。步入社会之后,曾任《南风窗》的欧洲主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约2003年前后,我个人也一度搞过时评类文字的写作,最终终于搁笔。其间,也曾一度听说,熊培云本身就是国内几家大报的社论执笔者。这一点,让很多时评人心折不已。——长期以来,国内较为开明的几家大报,屡屡能以时评类文字影响社会、影响个人。此类文字,若无深厚的积淀,断然是写不出来的。熊培云眼界开阔,耳濡目染,对西方社会的政治文明有独到的理解。如此丰富的阅历,写起评论来自然如行云流水。这么多年来,曾经深得其文字教益的人,究竟会有多少?这恐怕是一个不好揣测的问题。

关心时政的人士,口头上往往挂着这样一句话,他们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其实,这句话反过来讲大致也是可以的,即“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民众”。这里的所谓国家,我愿意理解为政府。一个政府的经营成功与否,与她的民众素质有必然的关系。而民众个人的素质与成就,又何尝不与他所在的国家息息相关?

胡适之先生说:“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这段论述,提醒我们一个民族开启民智的重要性。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或者称之为公民,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只有如此,才能谈得上进步与发展。

九十年前,青年周树人在日本仙台的医科学校里看到日本人为日俄战争胜利而疯狂叫好的场景,深受刺激。为此,他放弃医学转而从事写作。期望能够用精神上的力量来影响我们的社会。今天,我们的社会仍然需要这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我们的民族和他的民众仍然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熊培云说,中国的社会需要理想。这个理想,我想不仅仅是吃饱穿暖的生存理想,还应该有为人类社会作出思想贡献的勇气与力量。而建构这种理想,显然不能从空中楼阁开始。这种工作,必须从全面认识人类文明开始,从正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程与发展入手。

《自由在高处》,熊培云著,新星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定价:30.00

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当然可以算是一本能够充作青年教科书的读物。从写法上来看,与前几本书颇为神似。他的观点,比较新颖的仍然在于“增量民主”。他的大笔纵横捭阖,从文学到历史,到法学与哲学……不仅论述条理,而且通俗风趣。这,突出展示了一个不仅会思考更会写作的熊培云。这本书,你或许对他的观点有所保留,但往往会为其看似漫不经心的深刻论述而折服、而赞叹。

编辑荐书

《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美] 马修·比索普、迈克尔·格林著,丁开杰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定价:39.00元

这是一本论述慈善的历史、发展以及在当今社会中作用的书,兼述了慈善运作与国家、市场的关系,认为慈善在当今世界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其所进入的领域也需要认真选择,因为慈善资本毕竟比不上国家、公司的资本。从事慈善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的手段也需要不断创新,需要拥有理念和资本的人作出更多贡献。

村上隆:艺术与商业的联姻

《艺术创业论》,[日] 村上隆著,江明玉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定价:39.00元

□静子

不得不承认,村上隆将艺术和商业联姻的功力,结合浑然天成融贯东西的艺术特色,发出了这个时代最富有争议但也是最强有力的声音。“艺术家”这个名词的定义被他进一步地丰富——不但是纯粹的创造美好的作品,而且还要是个靠艺术谋生的商人,是瞄准各种资源、不放过任何商机的生意人,是艺术市场幕后的推手,是应当考虑生存与利益的社会人。艺术家需要钱,也需要名垂千秋,这就需要更多的方法来将自己的艺术价值最大化。在《艺术创业论》中,村上隆清晰地分析了欧美和日本艺术营销策略的不同,引导读者以行销的观念来对待艺术,提出了创造艺术价值的训练方法,以自己的亲身经验为读者带来启发。

今年49岁的村上隆创造了普通艺术工作者一生难以创造的奇迹:2006年,他的作品以一亿日元的天价定格为日本史上单件艺术品的最高成交价格记录;他是《时代》周刊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士;他与Marc Jacobs的合作使LV在欧洲消费的低迷时期攀上了销售榜首。在当今的国际艺术界,恐怕没有哪位艺术家能像村上隆这样,尽管周遭争议声阵阵,但在时尚界、文化界、艺术界、商业界依然能够腾风跃浪、傲立潮头。

其实,村上隆一开始在日本并不受欢迎,36岁时还在靠过期的速食便当充饥,每天守在超市的后门捡用来包画的纸箱。在书中,他坦诚地表示:在日本做艺术家似乎看不到什么希望——没钱、没地位,所谓的高等艺术和低级艺术之间只有咫尺之遥。他也很尖锐地指出:日本的艺术教育并不能很好地指导学生用艺术谋生的方法。同时,他毫不讳言自己充满野心的商业目标,更不避讳谈钱。“强烈的欲望并不会妨碍艺术的创作,问题反而出在大多数的艺术家没有强烈的欲望。只要能够清楚自己成为艺术家的理由,想做的事情就会显而易见。”为了寻找出适合自己艺术出路,村上隆没有停歇研究的脚步。最初,为了打破日本艺术界的陈腐规则,融入新的易被市场接受的表达方法,他经历了多重的阻挠和困难,设计了在日本并不被看好的“Miss ko2”系列,后来,这个系列在海外阴错阳差地被误认为是原始版本而以6800万日元一件的价格售罄,从而打开了欧美的艺术市场。紧接着,他将甜俗雕塑与“超级扁平”的风格进行到底,在国际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2000年,法国百年老牌LV的设计总监Marc Jacobs邀请村上隆合作,力求转变传统奢侈品的刻板印象。这次联姻,开启了艺术与奢侈品牌的跨界合作之旅。令双方都颇为满意的合作结果,仿佛为艺术家打了一剂强心针,原来艺术家还可以这样赚钱……2003年,村上隆一口气用了几十种颜色,将樱花、蘑菇等多彩图案用在经典Monogran Multi系列上,为人们带来感官上的欢乐和欣喜,将LV成熟经典甚至有点老气的形象瞬间转换,将LV的销售额瞬间提升了10%。2005年,尝到甜头的LV再次与村上隆合作樱桃包,村上风格的粉嫩花瓣和开心笑脸让全世界尤其是亚洲地区的潮女们爱不释手,继续开创了LV热卖纪录的新高度。2001年,村上隆成立了善于商业经营与品牌运作的Kaikai Kiki艺术机构,进行创作、策展、艺术品交易和艺术经纪等工作,培养和魔鬼式地训练签约艺术家,以集团化的方式获得最大的收益,现在已经发展到50个员工在东京,20个员工在纽约。

可以说,村上隆是当今将艺术和商业结合得最好的艺术家之一,他打破了艺术界一直存在的不屑于与商业市场挂钩的价值观念,在很多同行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从纯粹的艺术家,蜕变为一个精通流行元素和商业文化的生意人。他谈梦想,但更强调梦想照进现实。他不断地寻找艺术与商业之间融合的新的可能性,不断努力创造,让我们不禁期待他的下一个惊喜。